

【從影像反思二二八的記憶政治】座談會發言稿

重訪悲情城市

李尚仁

我並沒有預料到我還會坐在台上重新討論〈悲情城市〉，以及二二八、歷史與人民記憶等相關話題。我已經數年沒寫影評了，而且雖然我近十年來從事歷史研究，但是二二八事件乃至台灣史並不是我的研究領域（因此我今天的發言並不具有任何歷史專業性質）。自從當年我和梁新華等朋友在自立早報副刊發表幾篇評論悲情城市的文章、在《電影欣賞》雜誌編輯「電影、歷史與人民記憶」專號以及在唐山出版社的「戰爭機器叢刊」編輯出版《新電影之死》一書之後，我覺得我已經說完我想說的話了，不會再就這部影片或相關議題發言。然而，有關〈悲情城市〉的爭論卻從未完全遠離我，而會在出乎意料的時刻冒出。我幾年前在倫敦唸書的時候，當年台大視聽社一位只聞其名但從未謀面的學長，居然在前往歐洲旅遊的前夕，透過電影資料館取得我的聯絡方式。於是在農曆年很驚訝地接到這位學長的電話，熱情地邀我到位於 Bayswater 地區、倫敦最頂尖的廣東餐館之一的「皇朝」吃龍蝦麵大餐，還開了一瓶玫瑰酒。就在我們吃喝已足、交談愉快、情面由生而熟之後，他突然提到當年我關於〈悲情城市〉的評論，詢問我當初發表這些評論的過程與用意，並且表示無法接受我關於片中「女人無法進入歷史」的斷言。這時候我才知道天下沒有白吃的餐，原來這還是個「鴻門宴」。當然我們熱烈的辯論並不傷感情，事後我也修正我的看法：當年套用 Julia Kristeva 的有關於「女人的歷史」的理論來批評這部影片，確實是有誤用理論的問題。不過這件事情也讓我驚訝地發現這部影片，以及我們當年對它的批評，在多年後仍能激起令人驚訝的異議熱情和辯論動力。今天我會出乎意料且有點不自在的坐在這台上發言，似乎證實了過去的鬼魂不會輕易地消失，而會繼續糾纏。就我們所討論的主題來說，這樣的情境似乎也相當合宜。

在多次出乎預料發生的爭辯中，有兩次討論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我對這部片子以及相關議題的看法。一次是在倫敦和一位曾在台灣住過相當時間的外國人類學者談到這部片子，我提到我們當時對這部片子的批評之一是：它號稱是一部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史詩，全片卻缺乏一個宏觀分析的視野。我的朋友對這樣的看法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悲情城市〉這樣的表現方式是一大優點，因為在一個重大事件發生的當下，身歷其境的人對這事件往往只有片段的理解，難以掌握全貌。就好像〈悲情城市〉那些有著不同身分和不同關切的角色一般。例如，在「進步知識分子」討論時局的聚會中，寬美和文清卻選擇播放古典音樂唱盤，沉禁在他們的感情世界中；或是當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部分片中人物專心聆聽收音機上的新聞、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狀況。這些場景鮮活地呈現出這樣的事件情境。因此他認為〈悲情城市〉是部很人類學式的好電影。

另一次討論發生的時間較早，是我的評論發表後，接受某工運團體邀請來和他們討論這部電影。討論時一位年輕的工運幹部提到她的男友約她去看這部片子，她在去之前心中就忐忑不安，因為她是外省籍而她男友卻是本省籍，她知道對方看完影片之後的情緒反應會讓她很難面對。結果看完片子後，她男友講的第一句話是：「我以前都不知道你們外省人這麼壞！」這段發言讓我非常驚訝，因為即使片中的大反派是個外省人（雷鳴精采演出的上海黑幫頭頭），但我還是難以想像為什麼有人在看了這部片子之後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這兩次討論的經驗促使我重新反省當時有關「人民記憶」的討論。我們當年在多次討論〈悲情城市〉所觸及的二二八議題之後，我和梁新華注意到法國和英國的評論界對相關議題的討論，並且決定在《電影欣賞》雜誌上加以整理介紹。我們之所以會有製作這個專題的想法，主要是閱讀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訪談錄。在訪問中傅柯對法國幾部以納粹佔領期間為主題的電影提出批評，進而闡述他所謂「人民記憶」的概念，他認為人民對於壓迫與抗爭的歷史經驗，往往具有和正統歷史與主流媒體敘述相當不同的記憶，這種對抗性的記憶是反抗宰制的重要資源。傅柯的提法激起我們很大的迴響，我們覺得他提出「人民記憶」的說法，很適切地描述和突顯有關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記憶，在國民黨政府戒嚴時代為反抗威權的民主運動所帶來的動力。

除了翻譯和介紹傅柯的訪談之外，我們當時也介紹了英國《銀幕》（Screen）雜誌對這個議題的討論。《銀幕》的看法和傅柯不只大異其趣，而且對傅柯的說法有相當大的批評。事實上，提出「人民記憶」概念的傅柯，和一般我們所認識的那個對真理（真實）和權力的關係提出深刻批判、對代現（representation）系統的歷史性進行激進考察的「後結構主義」傅柯，似乎有很大的差異。傅柯在探討「人民記憶」時的態度更接近傳統的歷史學家，他似乎認為人民記憶可以提供我們某種的歷史「真實」（相對於官方史或主流媒體而言）。傅柯在訪談中推崇把他所編輯的《我，皮耶·希維葉》（*Moi, Pierre Rivière*）搬上銀幕的導演阿利歐（René Allio），盛讚阿利歐製作和拍攝影片時竭力回復歷史情境的努力。《銀幕》對傅柯的說法大不以為然，認為這種看法預設了歷史真實可以代現且有最「真實的代現」。粗略而簡化的說，以結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以及拉岡（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為理論基本架構的《銀幕》，向來批評寫實主義不留餘地。他們認為以寫實主義、線性敘述或是好萊塢電影，都是和資本主義與父權體系共謀的代現系統。因此，這類型式的影片創作即使是在宣揚左翼觀點，仍是唯心、保守而反動的作品。真正激進、唯物的電影必須批判主導性的代現系統，應該是反敘事、反寫實、具有疏離效果、不讓觀眾對影片情節角色產生任何認同的前衛電影，例如法國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的電影，尤其是他在六八之後的作品。從《銀幕》的精神分析理論立場來看，傅柯的說法預設了記憶的原初「真實」性質和穩

定性，而這點是完全無法成立的。傅柯對於忠於歷史情境的電影之推崇，更顯示出他某種類似「寫實主義」的錯誤美學立場。

我在編輯此一專題時，雖然注意到《銀幕》和傅柯的差異，對此卻沒有進一步討論，同時也覺得《銀幕》的問題意識和我們當時關切的議題有所隔閡。然而，今天回頭來看《銀幕》的批評，我雖然仍有些保留，特別是其強烈的形式主義傾向，以及以解構代現體系來取代歷史研究的做法，這些都是我無法接受的。然而，現在我卻更能體會到其所觸及的議題的重要性。因為記憶本身確實具有不穩定的性質，而對記憶的詮釋與理解，就如同對影像意義的解讀，都牽涉到當下情境所帶來的種種影響以及許多複雜的因素。〈悲情城市〉不像好萊塢電影或政治宣傳影片那般訊息簡化明確黑白分明，因此可以容許各種不同的解讀，這無疑是其藝術上的優點。然而，從前述那位工運幹部的男友對《悲情城市》的反應，就可以知道社會情境、政治情勢以及個人經驗都會影響每個人對影片的閱讀，甚至導致完全出人意表的解讀。或許正因為〈悲情城市〉上映的時候，也正是省籍因素在台灣政治局勢最為突顯且發揮很大影響的時候（不只是反對運動也包括國民黨內的政爭），因此導致有不少人會以省籍的角度來閱讀這部影片所呈現的二二八。這可能完全出乎本片編導的用意和預期，雖然當時電影出品公司的宣傳方式對此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同樣地，當〈悲情城市〉上映時，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觀眾對於片中蓄長髮的本省年輕男人四處搜尋追打外省人的場面，都感到相當的刺眼和難以接受。梁朝偉所飾演的啞巴文清一角，在火車上遭到一群暴民逼問其省籍時，以怪腔怪調的台語說出「我是台灣人」的一幕，更是讓人感受複雜。當時也有評論者從本土意識出發，對影片這樣的情節和場景提出批評。然而，當「愛台灣」、「認同台灣」等說辭在今天經常成為政治鬥爭的利器，甚至連民進黨的「大老」和「台獨理論大師」都無法倖免時，今天我重看這一幕卻有了和當年完全不同的感受。〈悲情城市〉呈現的這些衝突場面是否忠於當年的歷史情境，或是如吳介民教授所說看來更像是七〇年代三重夜市惡少鬥毆的情景，就歷史學者的立場來說，是可以透過歷史研究來加以考證的，而且這樣的考察絕對不應該受到當下社會政治情境的影響。然而，電影觀眾在觀賞這樣一部「很有人類學味道」的影片（借用我那位歐洲朋友的說法）時，當下的情境卻必然會影響對影片的解讀。那麼，對這些不同的解讀批判性地進行後設分析就有其必要。

從這個角度來反思「人民記憶」也可有所啟發。我個人是在讀國中時首次由長輩口中聽到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種種。對這位長輩所述說一些片段，我如今如今仍印象深刻。像是某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被軍人帶到海邊斷崖槍殺，水性很好的他在中槍受傷未死，趁勢跳入海中，行刑的軍人則以為他已經身亡落海。事後這人游上岸，在山上躲藏許久…或是，某日某學校排球場的木桿上被人寫上

「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字樣，於是當局開始抓人，有好幾人被抓到民眾服務社。其中一人的妻子想盡辦法行賄，才獲准前往探望，結果打開民眾服務社內某個房間大門，讓她大為震驚，因為在光線不明的房間中可以看到包括她先生在內的許多人，在遭到刑求痛打之後倒在地上吐血…。在戒嚴威權統治的時代，我和絕大多數同儕一樣從小到大都是接受「大有為政府」黨國不分的教育灌輸，因此當我從親近尊敬的長輩口中聽到這樣的事情時，受到的震撼是非常巨大的（雖然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國民黨民眾服務社是什麼東西）。這個經驗可說是我的「政治啓蒙」，對我日後政治態度的影響非常深刻。我所聽到的這些事情，其中最清楚的訊息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控訴。然而，除了反國民黨之外，從這些敘述卻很進一步難理解掌握它們的歷史意涵和其他的政治意義。在政治上要怎麼看待我所聽到的這些事情？外來政權對台灣人的迫害？腐敗殘暴的政府在鎮壓人民時不分青紅皂白的極端手段？冷戰時代肅清左翼的白色恐怖？…要對這些人民記憶有更深刻、更進一步的歷史理解，以及該如何從這些記憶中萃煉出更具體深刻的政治認識和行動方向，卻還需要其他的視野、思考和分析。因此在肯定與珍視「人民記憶」作為一種寶貴的歷史遺產和反抗精神資源的同時，我們還需要以一種分析性的態度來加以思考面對，而非單是沉浸在這些記憶所帶來的情感之中。只有事後透過具有智性高度和批判精神的反省檢視，才能確保「人民記憶」不會成為政治成見和族群歧視的來源，乃至人民和解的障礙，而能真正成為追求正義的文化遺產和精神力量。